

为积极的研究的重要性，以对以往研究中对消极方面的过分强调做出回应。这些批评发生在 60 年代晚期 70 年代早期，和态度激进的黑人对社会学学科提出的挑战相关，这一点我们今后再做讨论。这样的批评都起到了修正理论的作用，意义非凡。但再引 Williams 的一句话来说“钟摆晃出了界……这些最基本的也是最寻常的解释过分一般化，难以引起理论上的有效攻击和保护。”在强调少数种族积极健康一面的同时，这些批评越来越接近于对种族歧视毁灭人性这一点的否认。很快这些批评激起了应得的反对。正是在这种各极观点的争战中，我们得以保持对一种更加平衡的理论综合的期望。不论如何在我们以编年体例回顾这些论述种族关系的社会学著述时，仍需在心中存有这里所提出的分析偏向性。

五、本书的大致内容

第一部分的文章写于 1895-1915 年。其时主要有以下历史事件，1895 年 Small 创立了社会学期刊，而这一时期里南方乡村中黑人的大移民成了美国种族关系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第二部分的文章写于 1916-1924 年。这一时期里一战发生，移民数量巨大，通过了一些可以缓和种族关系的法案，堪称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但也有些希望重回白人统治时期权力结构的事情发生。

第三部分的文章写于 1930-1940 年，这一时期美国的大萧条笼罩了一切，对种族关系的研究也不免受此影响。

第四部分的文章写于 40 年代，这一时期种族关系变化剧烈，二战对此有着极大的影响。同时在这部分里也选入了一些探讨社会学和种族关系研究之关系的文章，对其后的研究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五部分的文章写于 1951-1960 年，这些年看似平静，实际上既有在学校里实行种族隔离法案的情况，也有对这些种族歧视性法案的激烈反抗。这些文章分析了这些现象，并说明了社会学是如何改造当时的主流种族观念的。

第六部分的文章反映了种族关系研究中理论转向在 60—70 年代的延续。对种族关系的动态、过程性的研究逐渐增加，具有不同取向和关注点的文章丰富了我们关注种族关系和社会学的视线。（参考书目从略）

（译者：任道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1999 级硕士研究生）

详析差异，寻求和谐：贝利兹内种族、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建构³

Laurie Kroshus Medina

高翔 译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国家主义者提出的计划，这些计划与组成一个贝利兹国家(a Belizean nation)的主张相互竞争，这些计划主张多元化的民族主义 (pluralist nationalism)，认为国家是由多个民族共同构成；而种族

³ 本文原载于《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0, Number 4 (October, 1997)，第 757-780 页。



综合主义者试图通过单一国家特征来掩盖民族或种族的差异；种族霸权主义则试图人为地将某一个种族的特性成为国家属性并且排除其他种族特征。在这些计划中，同质化的进程建构了国家的同一性，这又与构成亚国家的差异（subnational difference）的特殊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而正是种族、民族或两者的混合组成了国家的同一性和亚国家的差异。本文探索的是种族、民族和国家特征的基本实质如何促使它们之间彼此相互同化。

关键词：国家主义（Nationalism）；种族；民族性；贝利兹；文化

根据官方定义，贝利兹国家是一个“多元文化港口”的多民族国家，它具有文化多样的特殊轮廓和对这种多样性的包容两个特征。贝利兹的在多样性中的联合在政府创作的用于小学使用的教科书中的介绍部分被强调为：

贝利兹拥有她自己丰富的文化，包括贝利兹不同民族群体的文化遗产；源于贝利兹民族以及个人创造性努力所留下的精华。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共存于同一社区的文化的自然互动，因殖民政策的区分和规定而被阻止，因之确保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文化得以广泛的保持独立性，彼此间有显著的不同。并且殖民文化维持其显赫的地位。非殖民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部分必然是抹灭所有殖民所遗留下来的对其他每一种文化的歧视。我们民族的历史起源和近来较多对我们文化的影响，已产生了多样性。在这多样性之外，当认识到我们不同习俗和传统的价值时，我们必须寻求一种统一（教育部 1983，Minister of Education）。

在这个多样性的贝利兹国家，种族群体所指的成员包括主要的两大类，克里奥和西班牙，另外还有 Garifuna 和尤卡坦人，Mopan,和 Kekchi。每一类的构成包含 peoplehood，民族血统 peoplehood 的确认是有争议的，即是在族群边界的定义、同其他族类的关系和有分歧的方法的内容；然而，每一类型目前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被认为拥有独自の文化和独立的世系联系。Crede 这一类黑人特征和混合祖先，其中至少会有非洲人的因素（Judd 1992,p.172）。Garifuna(过去被视为黑色加勒比)包括一个“混合的”特征，归因于在东部加勒比，自由非洲人与土生加勒比社会在生理的和文化的混合。Mopan,Kekchihe 和尤卡坦常唤醒明晰的、以语言为基础的特征，尽管一些 Mopan 和 Kekchi 的领导人一直在为建立一个 overarching 的玛雅人特性奋斗。自我判定为西班牙人的人被官方标定为 Mestizo，Mestizo 是一个西班牙词，指混合的土生美洲的和欧洲的祖先。几种官方估计的规模较少的民族是——印第安人、中国人、叙利亚人、Mennonite 人和白人——是该国核心成员中较少的部份。

然而，官方就贝利兹国家多民族观点（vision）不仅是可行的建构（construction）。1990 年我参加过一次在周六下午举行的橄榄球赛；观众间的互动显示出贝利兹一个可选择的构成，是与官方的多民族定义相冲突的，也是对该定义的一个挑战。球赛是贝利兹队对抗从危地马拉来的一个队，危地马拉是贝利兹邻国，声称应拥有贝利兹的主权并曾威胁入侵。在该国威胁的背景下，这场橄榄球赛成了贝利兹表明其自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机会。球赛在与危地马拉边界相接的贝利兹西部举行，该地区明显的以西班牙人占多数。但是有许多观众从该国的其他地区来该球场观赛。并且和危地马拉一样，观众包括属于贝利兹国各个民族群体的人。尽管危地马拉队控制了比赛，一群站在我附近的西班牙裔贝利兹人仍然每到贝利兹队攻入对方球门时都会热烈欢呼，希望激励自己的这一方。当下半场贝利兹队经过危地马拉一方时，一个可能有些微醉的黑人，停在看台前并转过身对西班牙裔球迷喊道：“老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一个西班牙妇女回敬道：“我和你一样是贝利兹人！我们是在 Banquer，如果你到过 Banquer 你就会发现那儿没有黑人，但那儿仍



是贝利兹，并且我们是贝利兹人。” Banquer 是一个靠近与危地马拉接壤的边界的镇，该镇的人口大都被认为并且自认为是西班牙人。她的断言：“那儿没有黑人但仍是贝利兹”表明她理解那个男人的逻辑：黑人能被假定为贝利兹人；其他的不行。尽管他质疑她作为贝利兹人的认知，她通过反驳说西班牙裔同他一样毫无疑问是贝利兹人，挑战他的假定。

这个男人未被那个妇女的话说服，并且因贝利兹队的显然将要面临的失败而脾气暴躁，他回敬道“你们都刚过河！”他的话断言那个女人和他的同伴更应该是危地马拉人而非贝利兹人，他们非法越过边界，因此他们出现在贝利兹是犯法。

更加愤怒的西班牙裔妇女依据民族起源的基础断定她的出现是合法的。声明以 Mastizao 或西班牙为标志的玛雅人祖先，她回答：“我的民族早在白人把你们作为奴隶带到贝利兹之前就已经在贝利兹了！”她的回答颠倒了他们的特性，以她自己为本民族人而对方是外来移民，而且不是自愿的移民，而是以丧失尊严的奴隶身份被带到贝利兹来的。这个男人声称那个妇女是“老外”而非贝利兹人，根据的是她的体质特征；她对于那个男人是贝利兹人和他的祖先是奴隶的假定也是基于他的体质特征。双方都深深的激怒了对对方，通过彼此贴上有失尊严的标签来攻击对方的尊严——“老外”，奴隶。那个男人继续喃喃自语并交替不断的对着站台上的人咆哮那个妇女和她的朋友们是“刚过河的”“老外”。那个妇女最后改为以支持、并为危地马拉队每一次接近贝利兹队的目标来反击。

这个西班牙妇女在断定她自己 and 那个挑衅她的黑人属于贝利兹民族的成员时，同官方的多民族贝利兹定义是一致的。但是，这个黑人男人却用的是另外一种定义，把西班牙裔人作为“老外”而非把他们合并到他们之中作为贝利兹公民。他看作黑民族的贝利兹，没有把看上去是西班牙裔的人包含进去。这位妇女从对贝利兹民族的忠诚转变为支持危地马拉队的胜利，因而允许她自己通过参与到击败贝利兹队（那个男人的）的那一方，以此报复她被排除出贝利兹民族；这种行为也更进一步证实了那个男人的对于西班牙裔人是否真正的忠诚的假设。

这一冲突中的双方推进了各自相反的民族主义者计划，这些不同的计划按照截然不同的观念，冲突性的组成贝利兹民族。福克斯（Fox）认为民族主义者对“国家应该是怎样和将会怎样的”这一问题，通常表现出多元的、彼此有争议的定义。下文我将按照第三种贝利兹民族主义的观点来检验这两种民族主义者的计划，这第三种观点提供了不同的、常常是相矛盾的看法，而同时是贝利兹国家组成的基础。我也试图探讨从两种民族主义者的已经超出了国家的所有之外的计划中择其一的影响：这些有争议的计划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法去定义种族和\或民族差异和同一性，正如联结种族或民族独立性为一个民族的不同方法一样。

同质化和特殊化的进程：国家和它的组成

国家主义者的计划

一种国家主义者计划定义和限制作为一国内成员资格，把国家同特定的地域联系起来，并且组织政府在她的成员中进行资源的分配并做出解释。这一目标可能被制度化的政府、尝试夺取或建立政府的运动、或者那些关注政府资源重新分配的群体所执行。把地域同一定的民族血统 peoplehood 联系起来，国家主义者通过定义共享的特性来同化差异，该特性标志作为同一种民族的人居住在某一区域。这一同化的进程已经被引起作为对特殊化主义的进程的反对，该特殊化主



义化的进程是通过沿着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小地方或大区域这一条线，国家产生或组织亚国家（subnational）的差异。下文我将检验这个方法，同化和特殊化策略被整个联系到独特的民族主义者的计划，焦点在于种族和民族的特殊化的方面。

Bolland（1987；1988）已经区分了三种民族主义者的计划，这些计划代表不同的立场，这些立场是关于一国内（霸权性的、综合性的、多元性的）民族和种族同质性或异质性的。在霸权性民族主义理论里，人口一个首要的元素是 work to 使它自己的特征成为唯一的（exclusively）与这个国家相关联的特性。这个国家因而被定义为种族的或民族的同质性，并且这个成功的将她自己的特性联系到国家中去的种族和（或）民族群体，既成为“正常的”也是标准化的（比较威廉姆斯 Williams 1989；Frankenberg 1994）。把国家同一个特性等同起来而放弃（render）其他种族的和民族的可辨别的和有疑问的特征；定向于边缘或排外。

综合性民族主义者的计划是通过混合和联结实践与价值观（与民族文化组成联系而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国家文化和特征），探索创造一种共享的国家文化。国家的成员继而鼓励将他们的民族的从属关系放在一边，而去拥抱新的国家文化和特征（一切被假定已有了贡献）。综合民族主义因而通过再次确认特征和国家中的实践而非“亚国家的”术语 terms，致力于（work to）磨灭差异和同质化一定地域的人民。

对比之下，多元民族主义“包括 overarching 国家的特性的识别，依据公民权定义，按照将各特性协调为几个民族群体之一，这些群体一起被视为组成这个国家（Bolland 1987,p.12）”。多元民族主义“合法化几个种族和民族群体的共存、持续，和 hyphenated 特征（Bolland 1988,p.205）”。事实上，我们已经看见贝利兹是官方的定义为多民族国家。然而，我们也观察到黑人贝利兹足球队球迷致力于 working to 优先选择把他自己的特征与国家在国家主义异质化的模式联系起来，以那位西班牙裔妇女和她的同伴的生理表象而将他们排除在外。除了这些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民族主义者的计划之外，政府它本身推进一个综合性民族主义者的策略作为对应民族多元主义者重点的筹码。关注到贝利兹内的民族多样性的认知是潜在的危险和分裂，政府也 works to 致力于通过从不同的“民族文化”到汇集为贝利兹的国家文化和可以排斥民族独特性的国家特征，综合化价值观和实践。

同质性和差异的结构

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计划中的差别，指出国家的共性和亚国家的差异（subnational difference）中的共同结构：多元民族主义者将种族或民族的多样性融入一个国家；霸权民族主义把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特性与国家联系起来，也边缘化其他民族为“外国人”；综合民族主义试图融合种族和民族的差异到一个国家的同一中去。在这些目标中，按照种族或民族、或合并种族和民族两者，可能组成了国家的同一和亚国家的差异。是什么允许这些类型去相互替代或彼此吸收？

Peoplehood 的国家、种族和民族形式，都是人类代理 human agency 的历史产物，是组织经验的文化类型，是定义关系，定向行为。然而，许多有影响的 peoplehood 的结构模糊了人类中介（human agency）、历史的偶然性、以及包含在他们的行为和再行为内的力量，定义他们自己为“国家的”从属关系建立基础于一个社会和历史之外的“国家”的秩序之上。（Yanagisako 和 Delancy 1995,p.20）。在实在说的假设基础之上，种族已经被很明确的指定为一个“国家”的从属：个人的类别同种族的类别一起被视为共享一种共同的“物质”或“本质”（这就把他们从其他类中去区别出来）。这共享的物质，有时通俗的指“血统”，被理解为由父母传递给孩子的；据信，产生他



的形象（由生理外表被识别）的外在表像。(Alexander 1977)。尽管这种一个定义和限制了种族的类别的共享的物质（a “shared substance”）的信念缺乏生物学上的实在性，因为一种文化的结构它具有有力量社会后果。“共享物质”的呼吁对种族的差异划分界限（demarcating），国家化了那些差异；它把他们放到人类历史和人类中介之外、使他们成为绝对的和不可更换的。

如果种族已经被清楚的建构为一个“国家的”类型，民族的从属关系更加会被归入一份共享的“文化遗产”。然而，有关记述民族世系差异的概念的运用——在介绍中提到，它在贝利兹的实践被反映到有关民族群体特征的基因分析的描述中——把民族性联系到“共享的物质”的转移上。民族的标签的运用和正式文化的概念的技巧，进一步为“文化群体”的国家化和核心化做出贡献。文化这一术语指一种抽象，这种抽象已经被人类学家用来简单化和系统化规则和意义（是在真实的社会互动中时刻改变的（fluid）和面临挑战的）。然而，大众化的观点常常具体化文化、改变一个分析性的抽象为一种坚实的实体，例如捆在一起的几组“礼节和习惯”引用到政府构建的贝利兹的多样性的结构中去。这些因素促使民族性（描绘每种民族类型为转换历史的集合性的特征，这特征占据了它自己的文化）的论述出现（Handler 1991; Segal 和 Handler 1996）。文化差异的论述（差异是证实民族群体和他们的传统）描绘了文化和它的从属特征的轮廓，这一轮廓是“前道德的”和无终止的，在历史和人类的中介 agency 之外的；然而他们让民族特性与同样的实体论者（essentialist）的人类差异（报告了种族的建构）的概念直接面对。Glick Schiller 提到，当“文化的概念被用在国家化和核心化差异的途径上”，“人们可以说文化而继续去想种族”（1995, p.111），当民族差异逐渐被视为自然的和绝对的时候，民族的特征可能种族化：正如生理表征、文化的实践和价值观可能被定义为一种较内部的特质或物质的表达一样。作为一个结果，定义在民族或文化中术语的共性和差异的国家主义会像那些将种族作为他们的参考点的理论一样，可能尽量完整的实体化（essentialize）特征。

种族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特征的实体化(essentialization)有益于提供便利，使国家的、种族的和民族的特征能够互相吸收。接下来在区分一种从属类型与另一种从属类型时的困难已导致争论，这些争论是关于用一个术语去标明有关联的种族-民族群体和国家的形式（Fox 1990,p.3）。从这些类别的特性中识别不可靠性（slipperiness），我将不会区分它们，目的是反映贝利兹的不同的关系（terms）的用法，并且通过在贝利兹互相吸收的类别来探索这一进程。

国家财产的具体（物质的、重要的）结果

当在竞争性（该竞争指：在组成种族的和民族的特征、以及定义它们与国家的关系的互相竞争）的国家主义中的斗争，包括对象征和社会意涵的争议时，他们从物质的关注中表现出来，并且具有实质性的后果（material consequences）。既然在国家中主导的，常常是可以翻译为较强烈的呼声——确定权利和资源控制或由国家来开道路，在一国之内竞争荣誉的一席之地，同时包括整理国家资源的分布的斗争（Williams 1989,p.432; Verdery 1993）。确实，在贝利兹，对贝利兹的特征呼吁被看作正确的译为一些方面的优先权利，这些方面是：得到工作，土地，房屋和政府的项目，以及多种多样的民族主义者计划。这权利反映民族内的对这些资源的争夺。尽管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讨论关于在贝利兹种族和民族差异；以及把他们联系到这个国家的有争议的方法之象征性的章程——这些斗争仍然最终订立目标，就是去影响由国家控制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参见 Medina 1997）。



使一定地域住满人 (Peopling a territory)

在欧洲殖民者殖民美洲的初期，西班牙声称：包括今天的贝利兹在内的区域为其所属。然而，贝利兹当地的居民成功的抵制了西班牙人殖民和重新安置他们的企图*。贝利兹长期的殖民始于17世纪，当时是英国的私掠船在海岸沿线建立的一块地域，并且开始时是以非洲奴隶的劳动开展业务的。贝利兹殖民地在明晰的种族关系中 (terms)，产生了绝对的差异和等级制 (便利了殖民的目标)。在17和18世纪，官方的人口调查从奴隶中区分了自由人、及从以下人中抽出了肤色上的区别：白人，有色人种，和自由黑人。白人和黑人的类别被定义为“纯种族的”；他们的“混血”产生“有色的”人们，这些人是累积了财富和奴隶但是被排除于政治之外的人。重要程度的变化与“国家的”特征相符合。早期，在西部印第安出生的奴隶，因为被贴上“克里奥”的标签，被从那些出生在非洲的奴隶中区分了出来。“克里奥”是一个从西班牙语术语“criollo”中衍生而来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的”地位，“criollo”这个词后来被挪来作为一种有色和自由黑人成员类型的自我认知：因为他们为他们自己争取一个更重要的政治上的角色，他们争论到，作为这块殖民地的“本地人”，他们当然应得到能够维护好他们的利益的信任 (Judd 1989 ,p.112)。整个奴隶时代，少数白人成员定义他们自己为英国的国民和频繁的寻求英国军队帮助他们对付奴隶的反叛、“掠夺”“印地安人”，以及再现西班牙式的迫使他们 (被殖民者) 迁移的**攻击**。

19世纪被标志为解放奴隶和移入移民的时代。加勒比人，以他们在 St.Vincent 强烈的反对英国的蚕食而著名，开始到达贝利兹率先解放奴隶。加勒比已经把非洲人融合到他们的社会中去。并且，随着他们的失败，英国将他们分成了两个“有色的”类型，将肤色为较浅的“黄色”加勒比人送回 St.Vincent 和驱逐肤色为较深的“黑色的”加勒比人到洪都拉斯 (Gonzalez 1988,p.23)。在洪都拉斯，加勒比的小部分人开辟了他们到贝利兹的道路，在那儿，白人害怕一场加勒比人领导的暴动，试图把他们从奴隶中驱逐出去或是他们自己远离奴隶 (Burdon 1934,p.60-61)。Post-emancipation 移民包括小数量的从中国和印度来的契约性的 (indentured) 的工人，来自危地马拉的 Kekchi 和说 Mopan 玛雅人的群体，以及墨西哥尤卡坦 Yucatan Peninsula caste-war 的大量的难民潮，他们十九世纪中叶的到来使贝利兹的人口翻了一倍。从尤卡坦来的难民包括那些自我认同为白人或西班牙人的人，是或者出生在西班牙，或者出生在当地的洗礼过的“纯”西班牙后裔；印度人，同化种族的标签强加 (imposed on) 给当地人，即那些自我定义是许多拥有独一无二的语言、或属于一些政治团体的成员的当地人；并且 Mestizos 和印度人，还有在西班牙和 Mesizo 边界的民族类型很快模糊了，因为二者都开始运用“西班牙人”的自我设计来将自身区别于印第安人和说英语的人 (English-speaker) (Judd 1989)。

在后解放 (Post-emancipation) 时代，获得自由的奴隶被认为是克里奥人，从而将他们区别于移民。并且到19世纪末，白人也开始声称“本地的”地位 vis-à-vis (我们到我们) 移民西班牙 (immigrant Spanish)，他们觉察到作为对手的英国的殖民官员，对后者的优越地位渐渐的反感 (Judd 1989: 113)。在19世纪的后期，一个精致的神话包围着西班牙最后一次攻击殖民地，1789年，St.george Caye 这场战御，助涨了白人、黑人和有色人种对“本地的”地位的要求。奴隶主因为这场战争，描述轻便武装的被殖民者和他们的奴隶已经并肩战斗，以驱赶较好武装的西班牙海军离开贝利兹的水域。奴隶主声称“给予奴隶的表面的束缚 (galling yoke) 是如此的宽松和易于激励 (他们的) 黑人保卫他们的主人，在他们的这一边他们以最坚决的勇敢和忠诚进行战斗”



(Burdon 1931: 272)。一个纪念这场世纪战斗的假日的机构强调：“各色”人种（声称是在参加这场战斗的人的后裔）的每个人的“本地的”地位。这个假日最小化了奴隶制的残忍和剥削，向奴隶和奴隶主对贝利兹的忠诚致敬，并且嘉许（credited）他们使贝利兹地域从西班牙人的手中摆脱出来。

然而，20世纪期间，克里奥或“本地的”认知已从“越来越少暧昧的指黑人”（Judd 1989: 107）。在19世纪20年代，Garvey的范黑人进步联盟(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的贝利兹分支中的有色人种和黑人成员唤醒克里奥特征去呼吁作为“本地人的”权利(Judd 1992: 305)。在19世纪60年代，组织发展联合黑人联盟的年轻的克里奥人，从黑人在美国的权利运动中获得灵感，制造同黑人特征的克里奥“同义的(synonymous)”特征(Judd 1992: 308)。他们同时致力于磨掉在有色人种和黑人类型之间的区别，以及建立可以联合克里奥任何加勒比人的一个平和的边界出非洲裔贝利兹人特征。

集合为一个国家

随着19世纪移民逐渐更充分的合并到殖民的劳动领域,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经济的环境中与那些穷困的克里奥人平行：“他们是没有力量的，欠他们雇主的债，被阻止拥有和控制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且从参加政治和贸易中被排除出外”（Wilk 1986: 75）。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共同的不满引起他们超越种族边界整个殖民地组织起来，导致殖民地第一劳动工会的形式。普通工人联合会（General Workers Union--GWU）站在反殖民的立场，谴责因英殖民主义而带来的劳动阶级的赤贫，它的结论是控制着贝利兹经济的伦敦(London-based)公司(Bolland 1987: 9)。在1950年，当克里奥的中产阶级活动家组织人民联合党（the Peoples United Party--PUP）以推进朝向贝利兹独立的运动，GWU给予PUP领导权以背后的支持，因此很快共同倾向于联合会的广泛殖民地的组织作为它的党的推进器。

独立运动的浮出使贝利兹国家（它可以要求它从英国和危地马拉——是一个声称由西班牙那儿继承贝利兹地域的所有权的领国——的独立）的建构和运动成为必要的。带着这合并所有地域的居民为一个国家和为独立而最大化政治支持的双重目标，PUP领导者们推进一个多样化种族的策略：PUP（reached out to）西班牙，加勒比，以及各种各样的玛雅社区（被地理性的和象征性的远离于权力的中心）。沿着克里奥，合并先前的边缘的人口，这个运动是一个谨慎的策略，既然没有类型能代表一个绝对的人口的主体。1964年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当贝利兹被认可国内的自治：PUP赢得大选和掌握了太多的国家权力。

在执政中，PUP曾经进一步证实了多元主义者的国家的轮廓，介绍象征性的转换，是从在贝利兹庆祝 St.George.Caye 时，已经奖励他们由历史的基础位置中放置出来，在古远时期(antiquity)和加强它在它所声称的对有争议的地域的掌握，向锚定(anchor)贝利兹国家的发展中，PUP强调贝利兹的“玛亚人的根”，贝利兹的首都从克里奥大本营迁移到 Belmopan，Belmopan 是在国内为 Mopan Maya 命名的一个新的镇；并且在 Belmopan 新的政府建筑被设计为象征一个古代的玛雅人的广场。更进一步，假日的定立把给西班牙和加勒比的荣誉转给了圣乔治日（St.George），成为几个国家性的假日中的一个。尽管 PUP 遭受到反对党捍卫英殖民主义和与克里奥人在创立贝利兹的传统的核心角色的挑战，当英国提供的堡垒保证去反击持续的危地马拉的要求时，PUP 成



功地在 1981 年取得了贝利兹的独立。

多元民族主义：加强民族的多样性

在差异和相似性被基础性建立在殖民时代种族关系时，后殖民时代文化在官方的差异和相似性的结构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思想，伴随民族和文化的联盟，替代了种族的检验。后殖民的贝利兹政府定义贝利兹为多民族的。独立后不久，被本文引用的、由教育部定义的、学校教科书中的一段介绍，清晰的表明了政府的多元主义国家建设和它的文化及民族重心，而非种族的方法。这一段文章定义贝利兹国家为“多样性的”包含于它的“多样性文化伴随的”“不同的习俗和传统”。然而，这个国家同时代表在这多样性中的“联合”；所有的“文化”共存在一个社区中，贝利兹被敦促“寻求联合实体”。从种族向民族的转换，反映了注意力从种族或有色人种主义和不平等的关联转移，再次将注意力聚焦在文化的品质——产生平行的民族的地位和象征性的平等。每一民族被视为拥有它“自己的”语言、食物、音乐和“传统”。的确，Wilk 论述说，民族学被官方的允许，反映它得以“表达的”文化是一个焦点；民族的情绪与经济连接的关注，面临政府的敌意（1993：3067）。

当教科书定义贝利兹为“多样性的”（产生于 PUP 执政期间），反对党也逐渐用多元主义者的术语定义国家。早期立足在 Anglophile 克里奥的中产阶级中的对 PUP 的政治反对，已经寻求描述 PUP 的反黑人(Shoma,1987;Bolland 1991: 98)。然而，尽管 PUP 安稳于来自国外和以玛雅人占多数、起主要作用的种族地域的广泛的支持，它也保持克里奥人劳动阶层的跟随。1984 年，联合民主党第一次赢得大选，它已延伸它的主张到合并所有的民族类型的组成成分，接受他们的轮廓为“民族的”类型。1984 年运动表明，他们认识到了“许多民族和文化的群体的贡献”组成了贝利兹，并称他们为“我们国家的脊梁和它使整个历史进步”（UDP 1984：13）。继而，在目前，PUP 和 UDP 都注意穿越民族的界限的成分。因为没有一个政党成为与一个单一民族的联盟，党派政治没有被认证为民族政治，（因为在一些加勒比国家中他们被认为是民族政治）（Bolland 1986;1991）。对贝利兹文化多样性的拥护已经促成为他的国家特征中一个核心的方面。

作为在中美洲的加勒比国家，我们国家充当了一个桥梁和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庇护所，我们必须保护这种独特性（PUP, 1989）。

“多样性”因而被定义为一种财富；贝利兹人对它的接受，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种被其他国家模仿的“模型”。这种定义贝利兹是一个国家所依据的观点，是有它的特别的民族多样性的轮廓和它的民族多元性的庆典及合法化。

后殖民强调“文化的”和“民族的”差异，在定义贝利兹的性质时，与之平行的，是独立后第一次人口普查，也详析运用“民族的”标签（这种标签过去常用以标明贝利兹人中的差异）。用于贝利兹人口普查中的加勒比种族类型的标准，开始得到介绍；这一标准开始被转换到较好的反映贝利兹民族分类术语和规则中：1980 年，黑人类型标准被克里奥标签替代。并且种族类型代表 Mestizos, Maya, Kekchi, 和 Garifuna(更倾向于自我设定定位加勒比人)。这些类型代表种族和文化的分类。尽管“其他的”类型仍被设计为一种种族的类型。人口调查进一步转换的分类的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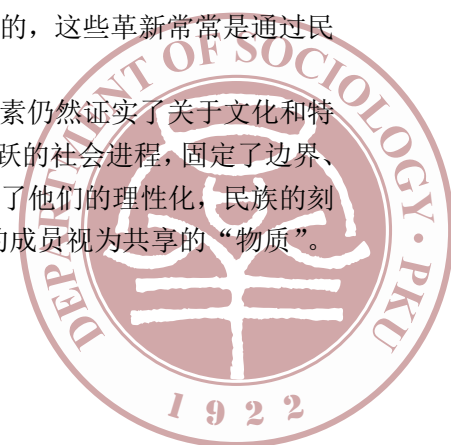
反映了文化的而非种族规则的差异化，并且他们被设计为民族的标签（见表 1）。许多类型反映出觉察到了文化的和语言学的差异：克里奥人，Garifuna，德意志\丹麦 Menanite，Mestizo，Maya Mopan, Kekchi Maya。其他类型把他们的成员联系到“古代的地域”（Segal 1993）：中国人、印度人和 Lebanese 人。一种有色设计保持：白。但即使这样，也被文化的概念和民族的差异复杂化。Menanite 在 1950 年移民到贝利兹，以保持在他们的社区和其他贝利兹社会之间很大程度上的分隔。在先前统计中划分为白人，1991 年他们被在白人类型中重置以及被单独分开，而反映了他们文化的独特性。

表 1. 贝利兹人口的民族分类（1991）

民族类型	按类型划分的人口所占的百分比
Mestizo	43.6
克里奥人	29.8
Kekchi Maya	6.6
Mopan Maya	4.3
其他的玛雅人	3.7
印度人	3.1
门诺派德意志人/丹麦人教徒 (Mennonite)	3.5
白人	0.8
中国人	0.4
	0.1
其他	1.0
没有填答/不知道	0.0

然而，从种族到民族——文化设计的转化不必要的降低对差异结构的强调。政府已提出关于文化的两个前瞻。在介绍中引入的教材中，文化伴随“习俗和传统”。然而，在其他的教科书中，政府以文化为一个活跃的进程——“包括习得的行为一代传递给一代”（教育部 1984：40）。前一个定义有更受欢迎的前景，特别参照民族文化，尽管后一个定义在国家文化的结构中坚持摇摆。作为习俗和传统的民族文化的 sense 得到官方标注——他们自己传授坚定的和独特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尽管贝利兹人有许多的困难，在把他们自己放到不模糊的唯一的民族的类型里。例如，我在 1990 年采访的一个年轻人解释说，他的父母说的语言禁止任何声称在它的身上玛雅人（的语言），他也不肯定他能够正确的自称他的西班牙人特征。尽管许多贝利兹人共同遭遇到是属于一种形式抑或另一种的困境，在民族联盟里的清晰性和模糊性没有、并且也不能被官方的对于民族的特征和差异设计所意识到；除了“其他”和“不知道”以外，没有官方的分类术语能够为那些父母属于两个不同民族的人所依据，或者那些已经学习和合并各方面（特征）到多元“文化”中去的人。依据祖先来对贝利兹的民族群体进行区分的呼吁进一步的加强了民族的标签命名清楚的群体。甚至，尽管文化的革新持续的出现，按照第二段课本中所说的，这些革新常常是通过民族传统的资料或民族祖先的实践被灌输为合法的和有意义的。

尽管这些具体化不是继承国家多元主义模式的一个方面，这些因素仍然证实了关于文化和特征的观点——这种观点，简单化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僵冻了的本应活跃的社会进程，固定了边界、实践、意义和这些边界所包括的个人。文化和民族标签地具体化便利了他们的理性化，民族的刻板印象化的行为、能力、或者趋势，被归因为特别的被一个类型中的成员视为共享的“物质”。



比如说，Garifuna 被认为在语言方面有特别才能的民族。作为少数群体，他们在学习将他们整合进去的较大的民族的语言时被限制，特别是克里奥语和西班牙语。进一步说，许多 Garifuna 已经寻求通过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职业——这种职业需要一定程度的英语——的向上的运动。一些得到许可为种族 Mopan 和 Kekchi 的社区服务的 Garifuna 教师，已经学习了 Mopan 或 Kekchi 语言。Garifuna 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常常被其他贝利兹人提及，但是对这一现象的通常的解释忽略了他们的民主和经济环境实践的必要性。取而代之，Garifuna 被描述为拥有天生的习得语言和教育的倾向。其他类型的人被近似的视为拥有天生的暴力、不诚实、必须的苦干、或懒惰，尽管这种归类是把类型同说话者的特征和背景联系在一起。这些观点强调了差异和特性，伴随着典型化理性的视角：民族差异逐渐被视为自然的、固定的和绝对的。

这一回顾中，贝利兹的个案某种程度上从 Segal 对特立尼达岛 (Trinidad) 殖民地的描绘中区分了出来，在特立尼达岛，“尽管‘混合’与‘种族’联系，它仍没有转换、消灭或创造他们。” (1993: 85) 在贝利兹，尽管当前的“民族”类型构成是由于不同的种族“起源”的“混合”的结果，那些标签也被视为标志坚实的人民“类型”差异，这些人们共享的独特的“物质”——是在过去各种有独特性的“物质”联的结果——并且代表“纯种”、整合各种类型到“混合”关系（穿越目前存在的边界）中。过去的“混合”被理解为已经产生独特的混合物和区分及揭示这些类型目前的成员的文化。

综合民族主义：谋求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和特征

政府的官方多元民族主义——该主义定义贝利兹民族为多民族组成，支持民族差异的概念；但是，同时政府觉察到民族差异的危险，其甚至可能导致分裂和在被定义为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竞争。在多元主义者的模式里，政府面临两难的国家建构：当证实民族差异，政府看见一种将那些不同的群体附属到一个国家需要。朝着这个终点，贝利兹政府已经做出尝试去建立一种 overarching、包含国家文化的综合模型，是指所有的民族群体对之贡献和所有的民族群体可以共享的模式。

当在介绍中引入的一段学校课本中的话，强调官方对多元民族主义在贝利兹的议程的支持，它也显露了一个与综合民族主义相平行的议程，后者以通过整合国家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来建立一个贝利兹的国家文化和特征为目标。教科书中的这一段文章申明贝利兹国家他的“自己的丰富的文化”由他的民族群体的遗产中衍生出来，正如“贝利兹作为民族和个人”的创造力。他谴责殖民“分隔和管理”政策，意在通过在贝利兹内禁止“国家的文化互动”来抑制产生国家文化所需要的创造力。文章暗示创造性的国家文化综合可能通过消灭“殖民遗留的偏见”和鼓励穿越民族边界的互动而便利后殖民时代。“国家文化”更不断的被视为开放的和活跃的，仍然在创造的进程中 (Bolland 1987: 12)。

然而，从国家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中，挪用特殊的“习俗和传统”为一个综合的“国家的文化”的结构尝试，已经遭遇阻力。许多贝利兹人已经拒绝采纳与民族群体联系实践，这一实践事将他们联系到非他们自己的、他们惧怕身份在那些居首要地位的群体之下。例如，一些克里奥人已经建议以克里奥的语言（广泛的说于克里奥社区之外）取代英语作为一种新的国家语言。当他们描绘这为朝向文化的非殖民化的一步时，其他民族团体已经视这一建议为一种新的语



言帝国主义的类型。进一步说，民族团体的成员常常坚持要保持对他们“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的所有权。当克里奥裔赞扬贝利兹的 Garifuna 音乐家创作的 puna 音乐为“一个贝利兹人对世界音乐的贡献”时，愤怒 Garifuna 已经坚持定义 puna 为一项 Garifuna 的创作。这种对综合的国家计划的抵制，反映了多元主义者国家建构的较大的成功。

也许在综合主义国家建构中，最广泛的尝试被反映到 PUP 独立后，立即开始的建立一个国家博物馆的计划。首先的是在那些赞同一种多元主义者的方法和那些更赞同综合主义的方法之间的执政 PUP 中有不同，每一个民族群体在博物馆里有它自己的空间，并且那些更赞同综合的方法，反对如此“部落主义”为国家建设任务的“副产品” (Price and Price 1995)。综合方法的支持者普遍在计划这个博物馆，并且结果设计显著的 下了差异——也模糊了刻画差异的线条——“通过持续的融合，磨合和再联合印象” (Price and Prince 1995: 102)。例如，博物馆计划者挪用与“不同背景”相联系的艺术物资、 和并置他们去创造一个“多元文化的仓库”。他们避免在民族类型的基础之上排列图像和信息，寻求通过并置“在整个博物馆里不同的组合照片肖像表明不同的贝利兹‘类型’”来替代创造一个“万花筒的影响”。这“变化的脸孔的安排”将象征“卓越的贝利兹民族联合” (Prince and Prince 1995: 101)。普遍的博物馆计划者的目标，表现为代替和创造一个独特的贝利兹“物资”和“文化”的综合。

然而，官方的朝向综合民族主义的努力，与政府多元民族主义计划相比，被发展的较少。博物馆计划 (museum projects) 仍被意识到；并且其他的创造一个共享的国家特征和文化的进步，已获得有限的成功^⑦。政府的最大成功在于：定义一个国家的文化包含她的核心价值观的特征。这一价值观断言，所有的穿越民族界限的贝利兹人共享“热爱和平和民主。贝利兹的国歌唱到它是“民主平静的庇护所”，并且它由市民执政的历史、“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以及两个主要政党权力的和平交替，已经被作为贝利兹的和平、民主天性的证明而被引用 (Fernandez 1989)。这图景已经被用于把贝利兹人绑在一起，是“同样的”；将贝利兹区别于中美邻国、特别是区别于被弃为暴力和反民主的 Garifuna。

霸权民族主义：种族化国家

官方综合民族主义以及多元民族主义者的议程都遭遇到一种非官方民族主义项目的挑战——更窄的定义国家。尽管官方的多元主义者的论述，定义贝利兹组成民族的群体为平等的、完整的国家的部分，许多贝利兹人不同意不同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贡献的平等，不同意不同民族群体在国家内适合的地方的平等。自从在国家中荣誉的一定空间被理解为，指向权利和权力所控制的资源，在贝利兹各组成的群体之间的竞争导致一些尝试，是通过一些群体推行民族霸权模式，即，优先将他们自己的种族和民族特征与国家联系起来。这些关于包含贝利兹领导权的斗争陷入清晰的对种族的论述，该论述联系类型特征、生理表征和刻板行为的基础为一个先天生物性或基质的假定。联系不同的类型来排序特征，这些论述把特殊性——种族化的——民族“类型”更加集中的联系到国家和边缘化其他民族（或种族）。

民族霸权主义正在被克里奥人积极的推进，同时 Garifuna 惧怕他们在“拉丁统治”的政体之下附属于西班牙。几十年来，这种关注已被危地马拉人要求得到贝利兹和它的选择反复威胁入侵供以燃料而日益增强。危地马拉国家的对她国内的暴力镇压，以及危地马拉黑人的社会和经济的



边缘化已经在贝利兹引起注意，并作为入侵将带来什么的例子。作为一个结果，危地马拉的威胁已经被克里奥和 Garifuna 贝利兹人在种族的条款中经历过：原先的 UBAD 领导者断言，“当危地马拉突然起意时，它的声明总是会做些什么的，这是使贝利兹黑人敏锐的意识到他们的肤色，因为危地马拉是这样一个种族主义者的社会”（Amanadala, 22 November 1991）。当 PUP 迫切要求并获得独立，一些贝利兹黑人害怕危地马拉将会入侵贝利兹和强加一个种族主义的政权，在这政权之下，他们将被推到这由“西班牙”危地马拉人居首要地位的种族等级的最底层。怀疑西班牙贝利兹人可能支持或站在强加这样的一个政权的一边，一些克里奥人和 Garifuna 人质问西班牙贝利兹人对贝利兹民族的忠诚。然而军队入侵的威胁并没有发生，贝利兹独立的第一个十年，成千上万的中美洲人，由于本国的赤贫、压制和政治暴力而被推出国内，移民到贝利兹寻找一片土地、和平和更高的报酬。主要是从危地马拉来的，许多人在贝利兹被划分成西班牙人。移民恶化了失业率（估计在 20%），对工资水平施加了向下的压力，为主要是城市克里奥人的贝利兹人移民美国的高比率添油加火（Vernon 1990）。同时，这些在克里奥人 Garifuna 人中产生一定程度的人口运动，这种运动在非裔加勒比和贝利兹人口的中美洲部分之间的“民族平衡”已经发生转换。1991 年的人口普查已计算出 40% 的人口为克里奥人，33% 的是 Mestizo（西班牙），1991 年普查区分出 44% 人口为 Mestizo 人，然而区分出作为克里奥人或 Garifuna 的人总共只有 36%（统计局 1992）。一些克里奥人和 Garifuna 人相信这些人口统计学的改变提高了在未来“拉丁人主宰”的可能性，甚至不用危地马拉的军事入侵。在 1987 年政府移民建议委员会（government-appointed Im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警告说：

[移民] 能够获得国家经济和政治权力比例的增长。当移民成为如此显要的多于本国人口，历史给了我们教训。适于用来提醒我们的两个例子是南非和伊斯兰……

[因此移民政策应该是] 聚焦在：伴随贝利兹需要的人力技术的人们的移民 [并且] 一种能够吸收到国家结构中的种族特征。（移民建议委员 1987；引入到 SPEARhead, 1987）

选作“教训”的移民人口，以大量的数目征服了种族定义的本国人口的极端例子，显示出非裔贝利兹人觉察在中美洲的移民的危险。事实上，克里奥和 Garifuna 的人常常遭遇来自西班牙贝利兹人和西班牙的移民的反黑人种族主义。对他们附属于西班牙裔多数群体的潜在的在未来的理解，鞭策着克里奥和 Garifuna 的领导人们建构和固化一种非裔贝利兹人种族特征的尝试，这种特征能够使两种类型成员联合和运动为针对西班牙裔数量增长的平衡物。1990 年已证明，“非裔贝利兹人的最高层”和国家范围内的非裔贝利兹人的社区，致力于朝向一个联合所有的在贝利兹识别为具有非洲祖先的人的目标的形式。

伴随着目前增长的就业竞争，对“西班牙”移民的关注和未来“拉丁裔统治”的潜力，也已强化了克里奥和 Garifuna 关于在贝利兹的人的利益和特征的怀疑（Medina 1992, 1997; Moberg 1993）。做不到的是、也许不希望的是从中美移民中去区分出贝利兹生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和 Garifuna 贝利兹人，常常质疑所有“看上去是西班牙人”的人的贝利兹特征。他们提到或直接说西班牙裔人为“老外”，就如在介绍中所描述的冲突中那个足球迷所作的。身体表征是西班牙裔的人，或在贝利兹占据公众的地位的右翼西班牙裔人遭到非裔贝利兹要求他们“回家去！”，威胁把他们从酒吧和公共汽车上驱逐出去的挑战。甚至，因为西班牙和玛雅类型之间模糊的界限，



非裔贝利兹人常对那些自我认同为玛雅的人同样运用“老外”标签。这挑战中的含蓄性是一个断言，即只有黑人可以自动的被当作贝利兹人。尽管日常互动穿越了民族边界，非裔贝利兹人正定义贝利兹为黑肤色，同时西班牙裔作为“老外”，把西班牙裔贝利兹人边缘化或排斥出贝利兹民族。

那些被划分为西班牙裔“老外”的人不仅被描述为非贝利兹人(non-Belizean)，也被描述为un-Belizean人。他们被刻板化为暴力的和违法的、倾向于犯谋杀和重型罪，以此对比和平的、民主性的贝利兹人。当政府偶尔试图通过建议“老外”可以由教育再进入贝利兹的途径来减轻恐惧，反对者表达了对“老外”是以“太不同的”文化整合入贝利兹民族内的关注，他们的存在威胁辨别贝利兹为一个民族的民主实践。移民委员会号召限制移民到一些人中去，这些人具有“一种能够同化到国家结构中去民族特征”，暗示西班牙裔移民将威胁分化而非同化到这结构中去。然而，当这些归类为“老外”的人被定义为，在文化上过于的不同，而不能配合到贝利兹国家和它的和平、民主的系统中去，他们按照生理特征而在种族的基础上被定性。

这些非裔贝利兹人论述的各方面和实践组成一项民族霸权主义计划，该计划种族化国家，合并黑人显型，许诺和平和民主，并且在贝利兹国家中给予荣誉。朝向民族霸权主义的趋势被反映倒第三党派的讲坛，贝利兹权力国家联合会，在1992这一有关同危地马拉的关系的政治辩论的期间，从UDP中分裂出来。在一次为吁请基金而访问在洛杉矶和纽约的贝利兹人的期间，NABR的克里奥领导人呼吁改变贝利兹的法律以允许“全部的”贝利兹人参加投票。他们解释他们的目标是把贝利兹人注册到“全世界”并且允许他们在贝利兹选举中投票，以抵消“上千的老外”涌入贝利兹和持续在选举中的（向上）滚动。一位NABR领导人警告说：

此刻，我们正在与一种情形战斗，指一种令人绝望的并且不确定我们会赢得情形，因为PUP政策已经充斥着外国人的选单(electoral lists)……我们估计可能目前在贝利兹有100,000的中美外国人，占据着贝利兹的工作机会并且组成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贝利兹人明显的不理解领导权和对我们的国家的控制权的重要性是什么。这场战斗将要持续未来的5年，谁来统治贝利兹？贝利兹人还是外国人？这才是关键。

虽然NABR已不能吸引足够的建构它自己同主要政党平等关系的资金，它已经吸引一些公众的支持。它的政治目标，挑战联合一种努力，即：让所有的贝利兹地域上的居民成为一个贝利兹民族的努力。自从最早的向着独立的方向组合一个国家的尝试以来，这一目标已被控制。相反，NABR建议定义非裔贝利兹人为贝利兹国家的构成、无论他们在那儿定居，而它同时否认住在贝利兹的西班牙移民的贝利兹民族性。

讨论

将贝利兹地域与贝利兹民族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已使一个国家成了一个为定义种族、民族的差异及共性的竞技场（舞台），这正是通过他们连结到国家中或从国家中排除出去的特权化或边缘化特殊民族和民族特征。很清楚，在贝利兹同一化和特殊化的进程被完全的联系在一起，并且尽管不同的国家主义者的计划，使他们通向不同的道路，种族的、民族的和国家的特征都仍然是



被建构和被制造去互相吸收。多元民族主义用亚国家的多样性术语来定义贝利兹国家性，识别和断定亚国家特征，鼓励连结合并民族的差异，融合同期的国家资源特征的各种形式。尽管多元主义者的关于国家建构的前景规划，运用精炼及非精炼的文化描述，扼要表述的前景已主宰了贝利兹文化多元主义流行结构，为民族差异的种族化和内部民族的竞争做出贡献。同时，综合民族主义的计划鼓励贝利兹国家融合他们民族文化的各元素到一个新的贝利兹国家文化中去，继而淹没了他们的民族特性到一个贝利兹国家的特征中去；国家的“同质性”被建议作为矫正民族“差异”可能性的危险的方法。民族霸权主义，不断努力以达到“非官方的”、被贝利兹人关注的、一个有潜力的拉丁裔居首的未来，倾向于给贝利兹国家贴上黑肤色或非裔贝利兹人的特征。它扼要表述了民族差异、民族特征，并且，使它与由综合民族主义者所定义的、非裔贝利兹人单独拥有的贝利兹和贝利兹人的和平与民主性格相一致的。因而，当那些被划分为“西班牙裔”的人在数量上超过非裔贝利兹人时，非裔贝利兹民族主义者计划建设贝利兹为一个黑人种族。

民族性的扼要表述，已使文化价值观和行为的特别类型被归入特别的种族的“精华”成为可能。这种实在说允许“文化差异”的概念去发挥功能，方法是用相似于排除出某些类型的成员于国家之外的种族主义。Gilroy(1987)和 Balibar (1991) 描述在英国和法国平行的状况，在这两国，分别出现了遭到怀疑的“生物性差异”和“种族纯洁”的观念被“文化差异”和文化整合的观念替代的事实。结果是，特殊的人们的类型被定义为文化差异过大，以至于危及对它妥协的文化传统的整合，而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被容纳。虽然这些被定义为有疑问的群体在文化上而非在种族关系中被组合，他们的独特性仍然被视为与生俱来的、不可以数量战胜的，危险的。甚至，当这些论述析文化的差异为问题时，在每一个方面中，如在贝利兹，被视为威胁国家文化整合的人们（people），在以生理表象为基础的种族的术语中可识别，也被识别出来。因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特征被合并在一起，并且国家的所有（national belongings）被种族化了，尽管过去常包含国家的而排斥“外国人”的术语强调文化的或民族的联盟。

如果在国家中优先的位置能够服务于较强国家控制和便捷的通向国家资源的队伍，向霸权种族主义发展的步子将代替一种非裔贝利兹人阻止他们潜在的成为数量增长的民族的附属的尝试，那些数量增长的人居住在贝利兹是可以归入西班牙人的。尽管这一策略是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一个部分，这场斗争正在被实现于一个种族化的结构中，该结构差异被认识为精炼的、绝对的和不能逾越的。这种结构毁坏了反对持种族主义的人的努力。（比较。Domiguez 1995）：它是种族差异的想法合法化，以差异为不可战胜的，并且导向种族主义者针对“看上去是西班牙人”的人的实践。以至于非裔贝利兹人对于一国种族化的论述具有说服力，她打开了转换种族霸权主义形式的门；事实上，它的对所有人因“同样的”而混入西班牙裔类型的想象，有潜力能够在那些自我认同、或被他人归类为西班牙人的人的社会和政治的坚固性中运用为催化剂。

最终，任何单独的民族主义者，于争斗的土壤中阻碍竞争着的民族主义的目标而获得成功是不太可能。贝利兹民族和它的国家的文化将浮现出来——并且继续受到考验——通过介于社会的代理人(social agents)提倡的、竞争着的国家主义者目标之间的、正在进行着的对峙，同时，作为贝利兹人商讨他们的利益和特征。然而，多元民族主义越强调民族差异，它就为种族化霸权民族主义提供了越多的支持。

注释：



1. 近年，随着中国移民和调查的增多，中国人类型已经非官方的渐渐与“外国人”地位联系起来而非是贝利兹国家民族中的一个成员。
2. 然而，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种族和民族特征的建构而存在的舞台。几种贝利兹的群体定义他们自己为较大的、蔓生的国家边界的、散居在外的人的一部分。
3. 贝利兹殖民历史的介绍是一个必要的总结。在 Bolland 和 Shoman 的文章中可以找到更多的完整的相应论述。
4. 在贝利兹的居民的木刻（woodcutting）是一个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反复商讨的题目。几个条约符合针对英国殖民者所运用的权力，但是辨别了西班牙对该地域的所有权。
5. 在这一上下文中，标明贝利兹的经济精英组成小数量的白人家庭是重要的。一旦在文化和政治的生活中，正如经济生活，他们现在在文化的和政治的背景中“实践可见”。
6. 这里，“印度”指出生在印度或祖先生于印度。
7. 例如，Wilk（1993）探索通过国家美人游行来建构国家的坚固性的尝试，争论这一游行暴露和吸引了正是他们寻求去抹煞的分裂。然而，Wilk 建议非官方的综合民族建构的尝试，已经比官方的方面更加成功：例如，没有国家的干扰，贝利兹已经定义了一个概括出来的和重新合并的多样化“民族皮肤”元素的“民族的皮肤”。
8. 在危地马拉主要的民族类型的成员区分他们自己为“Mestizo”，但是他们在贝利兹被定义为“西班牙人”或“Mestizo”。
9. 估计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移民数字范围由 40,000 到 60,000（Stone 1990,p.102）。1991 统计调查仅有 25,548 个生于国外的人，代表 13.8% 的贝利兹人口。
10. Vernon(1990)估计有 60,000 到 70,000 的贝利兹人移民自美国。
11. 例如，在贝利兹中心的一个村镇最近所作的一项研究认识到作为“外国人”的社区显示他们许多的居民是 Mopan Maya 人，他们从南部贝利兹迁移而来。（Stone 1990）
12. 这种族化的进程没有完全否认多元民族贝利兹构筑的建构：克里奥和危地马拉常识别出那些作为合法的贝利兹人出生和抚养于他们的本地域的西班牙裔贝利兹人。
13. Stone（1994）注明“西班牙”人——一个具体化另一个——自从十七世纪以来，当西班牙海军威胁贝利兹殖民地时，已刻板化为暴力的和危险的“其他人”。
14. 当两个政党都没有联系于一个单一的民族成分时，每一个政党都积极的巧妙运用组合民族的问题来吸引支持者或贬低对手。当 UDP 没有公职时，它的新闻报道听上去是关于“外国人”认罪、篡夺土地、因 PUP 而得以注册参加选举、且引导他们自己一种“非贝利兹的”态度的警告。因它的这一部分特点，1989 年，PUP 的国家运动标语是“贝利兹的第一”。
15. 同样重要的，在聚焦于未来介于西班牙裔和非裔贝利兹人之间潜在的不平等，这计划失败于：遭遇被标明是在目前被贴标签是白人的小的类型和所有其它贝利兹人之间的不平等。通过另一国家主义者的论述，不成比例的白人享有经济资源和白人在贝利兹国家中的成员资格的控制被保障和合法化，该论述给予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投资者一个在这国家中的荣誉的位置。（参考书目从略）

【学术纵览】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2000 年学术工作简介

